



中日网

---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当前位置: 首页 > 研究专题 > 中日关系 > 论文

日本政治家古井喜实对华友好观及其活动

发布时间: 2010-05-12 点击次数: 348 作者: 翟新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200030)

摘要:自民国国会议员古井喜实作为日本内阁僚级的保守政治家,在中日复交前积极主张对华友好,为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的深入展开尤其是备忘录贸易体制的维系身体力行,对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古井的对华活动根植于中国对日本的市场拓展和安全保障具有难以替代的意义这一对华观之上,这也从根本上规定了古井对华认识及其实践的特质。

关键词:日本政治家;古井喜实;中日关系正常化;备忘录贸易

中图分类号:D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0)01-0148-0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长一个时期内,中日两国之间一直处于没有正式邦交关系的不正常状态。但即便如此,双方由一些政党团体及个人主导的谋求两国亲善甚至关系正常化的思想和运动并未中断过。就日本方面而言,如考虑对日本政府形成对华政策和对外立场的影响力度这一点,似可首推执政的自民党内一批国会议员长期推进的对华交流活动,在促进中日复交方面建功甚巨的古井喜实就是这样一位保守政治家。本文拟通过古井在国际政治过程中的对华活动,探究其在对华复交事业中的作用及其思想基础。

1 古井1903年生于日本鸟取县八头郡郡家町,1925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后,进入中央政府素有“超级精英”机关之称的内务省工作。此后古井的仕途发展可谓一路顺风,在内务省官至警保局局长,一度还出任茨城县、爱知县的知事,至战后初期东久迩宫内阁成立,他又回内务省任事务次官,实际上成了日本全国的警察头子[1](P45-76)。

尽管战争期间古井在做内务省秘书官时为了工作方针问题曾和时任内务省大臣的东条英机发生过争执[1](P42),但因战争后期位居内务省高官,1946年,他被美军占领当局列为整肃对象。1950年处分被解除,古井旋即开始政治活动,并在1952年的大选中,从改进党方面参选,最终顺利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同年他出版了《日本向何处去》一书,就日本战后的国家重建和民族复兴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在书中,他写道:日本要重新站立于世界之林,必须解决当前面临的民族安全、经济复兴、生活稳定这三大最为迫切的课题;在冷战不断激化的当今,日本要谋生存发展,其实只有三条道路可走,一是成为自由主义阵营一员,二是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一员,三是采取中立立场,本人不认同社会主义,而中立道路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也无甚现实性可言,故为了确保和平和国家的安全及繁荣,日本应该选择和自由主义阵营结合;但即便如此,也“不应该对社会主义国家施行不必要的挑拨政策,日本尤其不应该忘记亚洲各国。亚洲是日本的母胎,日本的自主、安全、繁荣最终都不能离开亚洲而存在”[2](P72)。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井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主张日本应以灵活的姿态处理与东方阵营国家的关系以及高度重视亚洲的对外认识。应该说,在战后初期日本的保守政治家营垒中,持有这样富于见地的外交政策观的人士是不多的。

1959年7月,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邀请,古井作为日本国会预算委员会的成员获得机会对欧美九国进行考察。通过这次为期一个月的出访,古井不但对世界局势大开眼见,还开始对国际问题予以相当的关注。不久,古井受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众议员的邀请,参加了松村访华团的大陆视察活动。松村的这次访华有着深厚的政治背

景,由于当时的岸信介内阁在对外关系问题处理上过于向美国倾斜,导致中日之间关系急剧恶化。因此,松村等人的中国之旅就有着打开两国关系僵局和加深相互了解的架桥作用[3](P90-102)。这次不寻常的外访对古井而言,也是他一生第一次与中国方面直接展开交流的活动。经过一个半月的中国实地考察,古井的对华认识有了新的升华。从古井回国后发表的言说,我们得以知道这位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保守政治家当时持有如下对华政策观:

第一,从自由主义者的立场看,共产主义政治自有其“缺陷”,但根据实地考察所见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成功事实,北京的共产主义政权不但不会像国际社会一些势力所宣扬的马上会垮台,相反其统治的基础将会越发坚固。另一方面,中国虽称社会主义国家,但在其民众的意识当中,比起共产主义革命,更占主流的则是清算“腐败的过去”和振兴新社会的政治感觉,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在中国有更大的影响力,所以只停留于表面现象对其观察,会使判断出现偏差。

第二,中国现今虽和世界形势基本隔绝,谈不上是国际社会中的一员,对自己的国际地位和世界责任也没有意识,但中国从自身需要出发,并不像一些人所说十分“好战”,它依旧是渴望和平的民族国家。而中国在这以前对外部的过激反应,其实主要责任往往在于那些对其施行封锁政策的国家,所以鉴于把中国的和平事业建设排除在外是徒劳和无效的,包含日本在内的有关国家应该及时向中国伸出真诚之手。

第三,中国主张在尊重各自的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发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所以其真心希望与日本友好相处,这就并非如一些人所说,是为了推行所谓“赤化日本的政略”;在两国关系问题上,中国人至今一直害怕日本复活军国主义,而日本人也有担心“中国侵略”,这种互不信任的根源在于双方互不了解,所以打开日中两国交流之门并非不可能,并且更多的原因还在于日本,尤其是日方以前长期给予中方那么多的不愉快,而现在却对此都不愿提起,这正是最大的问题所在[4](P165-169)。

由此,我们似可看出当时古井的对华认识及政策观的特征:第一,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古井通过把革命后中国社会的性质解读为是以民族主义为基调的,巧妙回避了中日之间因意识形态和体制迥异引致的阻隔,从而为自己的对华观乃至对华活动找到能够自圆其说的思想政治基础,也籍此显示了在介入对华关系问题处理上可以与对方共通的精神交汇点;第二,古井是从日本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发展形势的需要,毅然决然担当起对敏感的中日时政问题的处理之责,并试图以对中国的政局和状况的相当理解构筑起两国交流的国际政治舞台,这种政治勇气和胆识情怀在当时日本保守阵营是十分少见的。

2 古井是从1959年的访华才开始真正涉足对华交流活动的。而且,这次访华对于古井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通过此行真正确立了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将有益于中日两国乃至亚洲和平的对华观,这也成了他之后展开政治外交活动的思想出发点。如古井返回日本后,作为自民党内关于修订日美安保条约的反对论者,他在国会对岸信介首相进行长达数小时的诘问[5]。不过古井批判日本政府修订日美安保条约,并非反对条约的内容本身。根据他撰于1960年的报告书《政界第八年,旅游各国,思考我国外交》可知,古井当时认为仅就提高日本国家的自主性这个根本意图看,修订日美安保条约没有大问题,但此举如果无端刺激中国等周边国家,给世界和平和日本在亚洲发挥正常的作用带来负面的影响,就不是外交的上策。尤其是日美安保条约修改案要把金门、马祖也包括在防卫圈内,这就有使日本卷入本无关系的国际纷争事件的风险。也就是说,古井从这时起就坚持在涉及中国问题时,一定要将其作为世界和平问题的一个环节加以考虑,因此作为中国邻国的日本必须自觉意识到自己具有和其他国家不同的立场,“日本虽是自由主义国家,但没有理由一定要从属于其他的自由主义国家,日本的道路必须由日本人来选择和开拓,在处理与中国相关的问题上,日本应该对其他自由主义国家进行启蒙和指导”[2](P118-119)。不过,在众议院安保特别委员会关于新安保条约审议的过程中,古井的意见和观点虽然得到一些政治家和舆论的支持,但由于日本政府和自民党主流派坚持固有立场[6],最终迫使古井和松村等只得以缺席方式对条约修改案表示异议[7]。

由于古井在一些重要场合经常公然批评日本政府的领导人对美国和台湾倾斜的外交政策,以至于被人评为保守阵营的“极左派”[2](P117)。

1960年,古井入池田内阁任厚生大臣。但他于第二年即辞去大臣一职,重又积极关注起对华关系问题的处理,并随松村等数次访华参与或主持各种对华交涉活动。1965年1月,古井和松村、藤山爱一郎、宇都宫德马等在自民党内发起成立超越派阀的亚非问题研究会,试图通过这类政策研究集团的研讨活动,影响自民党执行部和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古井在亚非问题研究会中任副会长,利用这个工作平台,他长期为转换日本政府和自民党主流派保守的对华政策观做了种种努力。1966年,在亚非研究会召开的中国问题听证会上,古井作为执政党的国会议员公开批评佐藤荣作首相袒护美台的对华政策,在当时日本媒体激起强烈反响[8]。古井的这个举动绝不是出于党内派阀权力斗争的需要,而完全是基于发展中日关系有利于日本国家利益这一考量的所为。他明确地说:

“中国问题首先也是日本的问题。如果两国关系不睦,日本既无幸福也没将来。同时那也是亚洲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无视中国,就没有亚洲的稳定和世界的和平。并且,能够承担解决这个问题的只能是日本。日本既能和自由主义国家相互理解,如果谨慎处事,也能和中国友好相处。我认为致力于这个问题不单是为了日本,也是日对亚洲和世界的责任。” [2](P160)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井正是出于考虑日本长远利益的需要,才把佐藤消极的对华政策作为抨击对象的。

1969年,处于“文革”狂澜的中国方面所持的对日姿态趋于强硬,并且明显增大了对佐藤内阁批评的力度。面对这样的国际政治形势,古井为了维护作为两国政治意思沟通管道的备忘录贸易体制,也为在自民党内及国内培植稳健的对华舆论,明确地指出中日关系发展所面临的“两座大山”。古井指出,中国批判佐藤内阁的政经分离对华政策,认为以政经不可分原则处理两国关系问题的要害在于对台湾问题和日美安保问题的处理,而这两个问题对于日本来说,实如两座难以逾越的大山。关于台湾问题,古井指出,既然中台双方都说只有一个中国,其他国家再鼓吹什么“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就不外乎是一种僭越,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那种权利。按照这个逻辑,解放台湾也只能理解为中国的内政问题。现在日本政府虽希图两岸问题能维持现状,但这个问题的本质并非属于讨厌还是欣赏哪一方的感情论的范畴,而是如何处理才更有益于日本和亚洲乃至世界这一问题。在对问题的实质做了如此揭示之后,古井明确主张:当下日本政府应以政治勇气做出决断,把北京政府作为全中国的正式代表,与之恢复邦交。关于日美安保问题的应对,古井认为,安保条约虽具保障日本安全的作用,但也有服务于美国对外战略的意义。特别是其中的远东条款,因该条约没有预设健全的事前协议机制,就不免有被拖入与日本无关的远东纷争之虞。另外,古井也提出,虽然日美安保条约主要针对的不是对华关系,但是只要美国的远东政策不变,就无法否认日美安保条约对中国的安全保障存在的威胁性,所以如果真想发展日中友好关系,进而实现邦交正常化,必须正视这个安保条约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的负面影响问题。最后,古井甚至断言:如果不能超越上述两座大山,“两国就难以复交” [9]。也就是说,古井此时已经明确认识到台湾问题和日美安保问题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的严重障碍性,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古井这些言论足可称作是对佐藤内阁对华政策的当头棒喝,在当时的保守政治阵营中,是离自民党主流派和执行部见解最远的,却是距中国的立场最近的时局观。

3 1972年之前,中日两国由于没有邦交关系,双方带有政治性质的交流活动主要是在备忘录贸易名义下展开的。而规定这个有特殊意义的贸易的国际文件中日长期综合备忘录贸易协定,正是1962年古井随同松村等访华时和中方共同确认以积累及渐进

方式发展两国关系的原则基础上签订的。在没有正常的双边关系的背景下,这个经贸体制的确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它为两国高层疏通政治意思设置了有效的管道。古井等在处理备忘录贸易的同时,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工作就是就两国间存在的双边关系问题和不同意见与中国领导人等及时进行会谈,借此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有效解决或搁置相关的问题。因该联系管道有此特殊的作用,故20世纪60年代以后两国间再也没有像20世纪50年代末那样发生一些由突发事件导致两国交流全面中断的现象。第二,它也不失为累积两国经贸交流实绩的重要平台。据有关统计表明,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对日贸易中,在备忘录贸易体制下的贸易额占了总量的三成以上[10],尤其是该贸易体制规定日方应以优惠条件对中方提供化工成套机器设备等,这对当时急需先进设备而进口途径相当有限的中方来说,意义甚大。

在发展备忘录贸易过程中,因东亚国际关系形势的不断紧张和中国“文革”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极不稳定,这也使双边的经贸活动发展经常受到影响。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一直担任日方备忘录贸易协定延长交涉日方主要代表的古井不时面临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方面为了排除日本保守势力和美国及台湾方面反对备忘录贸易尤其是将化工成套设备以优惠条件提供于中国这一障碍,必须经常以各种方式对自民党政府展开说服工作;另一方面,为使贸易额迅速增加,更重要的是为使备忘录贸易体制得以延续,古井等人还要不断和中方进行种种交涉,尤其是当两国政治关系陷于僵局时,关于贸易协定延长的交涉就成为大难题。在贸易协定延长交涉中,最费时日的并非贸易交涉本身,而是作为贸易交涉前奏的政治会谈。政治会谈的话题主要围绕日美安保问题、台湾问题、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非经贸性问题展开,古井等和中方代表之间经常是以激烈的争论贯穿于会谈的始终。在很多场合,古井被中方指责为日本政府的辩护人;但当古井回国后,则又会因其其在谈判中一定程度显示了对中方立场的理解,要遭受自民党方面的猛烈批判[11],甚至还被日本的一些革新政党挖苦攻击[1](P144-145),一些右翼组织还多次向古井寄送装有子弹头的恐吓信,迫其改变对华立场[12]。当时东京大学教授卫藤沈吉则把古井的对华交涉姿态比作日俄战争后以一定的妥协姿态签订了朴斯茅茨条约,但回国后却遭到一些日本人斥责的小村寿太郎外相,称其为“昭和的小村寿太郎” [2](P176-178)。

古井在回应国内民众指责他的对华交涉是“屈辱外交”时则坦然指出:第一,这些批评其实骨子里还是有重

视美国和轻视中国的潜意识在作怪;第二,有人批评自己的对华交涉是在施行所谓“磕头外交”,但关键还是要看这样做究竟对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有没有必要。正因为有此认识,古井在对华交涉过程中基本上对中方的政治要求采取了妥协和配合的姿态,并且最终还认同中方一贯坚持的政经不可分原则以及关于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13]。由此,也可以说古井是战后日本保守阵营中最早且也最为彻底接受中方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立场的政治家。

4 1971年年底,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给日本朝野猛烈的冲击。美国突然转变对华政策,这也给长期站在前列推进对华交流活动的古井等保守政治家相当的刺激。在这样的背景下,古井继续活跃在自民党高层和中国共产党政府之间,为双方沟通政治意思发挥着桥梁作用,也就是说开始为复交谈判做相关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古井和入江启四郎、入江俊郎、坂本义和、野村浩一、小岛太作等成立研究会,以探讨具体的对策。另一方面,古井还积极地向准备竞选自民党总裁的执政党各派领袖介绍中国的情况,对这些未来的国家领导人宣传其长期坚持的对华友好政策观。

1972年5月,古井为使即将到来的复交谈判顺利进行访问了中国。在华逗留期间,古井向周恩来总理等详细介绍日本国内与复交问题有关的形势和人事状况,并提出佐藤首相之后田中角荣上台掌政的可能性最大,而这个结果也将最有利于解决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这些信息的提供无疑对当时中方高层制定适当的对日政策起了重要作用。9月初,古井受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委托,和田川诚一等携带日本政府的复交方案再次访华。此行的具体目的主要是为准备即将举行的两国首脑会谈,和中国方面就复交三原则及台湾问题等进行意见调整。会谈中,古井转达了日本政府关于两国首脑会谈后公开发表的联合声明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由序文三条和正文五条组成。其中正文主要内容有:两国政府确认终结战争状态;日本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中国方面再次确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日本方面理解和尊重中国的主张;中国方面放弃对日赔偿要求等。9月12日,古井等在人民大会堂和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周总理高度评价古井等为维持备忘录贸易体制和两国复交所做工作的开拓性意义;并对古井转达日本政府关于未来首脑会谈的方针表示谢意,还就复交谈判的前景做了乐观的展望[14](P366-367)。

9月19日深夜,古井等应邀在人民大会堂再度与周总理会谈。席间,周总理向古井说明中方关于两国复交的观点,并进而确认了日本方面的有关情况。9月23日,古井返回日本向大平汇报了和周总理两次会谈的情况。9月25日,田中首相启程访华。9月29日,两国政府首脑签署联合声明,宣布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15]。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井的对华交流活动也为中日复交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5古井的对华活动在国内曾遭到种种非议和政治压力,即便在实现中日复交当年即1972年的众议院大选中,人们也没有因其为国家对外事业所做的杰出贡献而予以特殊待遇,相反因古井长年忙于对华交流无暇顾及国内政治和故乡居民的诉求,以至于在竞选中意外落选。但这个挫折并没有妨碍古井继续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发展对华交流活动,直至1995年去世前,他一直作为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的会长为两国民间的友好事业默默尽力。古井写于中日复交前夕的以下感慨,似乎多少可以注解他长年从事对华活动的思想动机:

日本和中国尽管是邻居伙伴,但相互国境却至今尚未敞开。对方国家地域辽阔,有七亿民众生息其中。从那里曾有儒教和佛教及其他文化传来日本。战争期间,在中国的大地上打仗、生活并对其抱有很深记忆的人不在少数。今天,那里的七亿民众正在为重塑社会和人进行着世无前例的伟大实验。中国人是满怀信心和决心在走自己的道路,我想对此表示理解并祈愿其成功。另外,我也期望尽管彼此社会体制不同,但两国能相互尊重各自的立场,互通有无,共同建设起繁荣、和平和富裕的亚洲[16]。

在这里,我们除了能看出古井这样的知华派保守政治家对当时中国状况的高度关注和理解以外,还可察知其将两国关系的基本性质规定为在相互尊重各自制度和体制的前提下的共存互益的战略眼光和原则立场。特别是后者,对于我们区别它和当时革新党派的意识形态、对华立场的不同,以及理解当下日本保守政治家也基本赞同的互惠对华政策观,是颇具启示意义的。

总之,在东西冷战和中日没有邦交关系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古井虽为日本阁僚级的保守政治家,但却仍能长期客观认识对华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并在两国关系进展最为关键的时刻不顾个人的政治风险,挺身于对华交流乃至中日复交事业,这在当时的保守政治阵营实属难能可贵。古井所以能在保持自身政治信仰和理念的同时,不惜以各种方式推进对华关系,这固然与他在长期对华接触中累积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认识和理解不无关系,但更为根本的理由则还在于其一贯坚持中国对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安全保障具有无比意义的对华观的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像古井这样的基于国家利益的立场高瞻远瞩认识及处理对华关系的国际政治观,也是为中日复交前坚持推进两国关系发展的日本政治家群体所共有的精神世界。

参 考 文 献

- [1][日]古井喜实.山阴出生:一个政治家的人生[M].东京:牧野出版, 1979.
- [2][日]居安正.某保守政治家——古井喜实的轨迹[M].东京:御茶水书房, 1987.
- [3]翟新.松村谦三集团和中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 [4][日]古井喜实.日中十八年——一个政治家的轨迹和展望[M].东京:牧野出版, 1978.
- [5]自民党古井氏今天质问[N]. (日)朝日新闻, 1960-05-12(1).
- [6]首相以“远东范围”答辩[N]. (日)朝日新闻, 1960-05-13(1).
- [7]反主流派增强慎重论[N]. (日)朝日新闻,1960-05-14(1).
- [8]公然批评佐藤内阁[N]. (日)朝日新闻, 1966-05-12(1).古井氏批评中共策[N]. (日)每日新闻, 1966-05-12(1).自民党左派的中国议论[N]. (日)读卖新闻, 1966-05-14(1).
- [9]日中所隔的两座山[N]. (日)朝日新闻,1969-04-09(2).
- [10][日]日中经济协会编.日中备忘录的十一年[M].东京:日中经济协会, 1975.
- [11]自民党总务会对古井氏强烈批判[N]. (日)朝日新闻(晚报), 1969-04-08(1).
- [12]给古井氏住宅寄装有子弹头的恐吓信[N]. (日)朝日新闻, 1969-04-17(1).
- [13]备忘录交涉团和中国方面发表声明[N]. (日)朝日新闻(晚报), 1969-04-04(1).
- [14][日]田川诚一.日中交涉秘录田川日记——14年的证言[M].东京:每日新闻社, 1973.
- [15]日本和中国现在复交[N]. (日)朝日新闻(晚报), 1972-09-29(1).
- [16][日]古井喜实.通往日中复交的路[M].东京:国际问题研究所, 1971.

(原文转载于郑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一期 编辑:秦利明)

•